

中国哲学史 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柴文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哲学史 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柴文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江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 柴文华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86-0109-2

I. ①中… II. ①柴… III. ①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0925 号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ZHONGGUO ZHIXUESHI FANGFALUN DE LISHI WEIDU

柴文华 著

责任编辑 魏 玲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109-2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萌芽	12
第一节 中国学术史思想的发展	12
第二节 中国学术史方法论的特征	18
第二章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	27
第一节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29
第二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	40
第三节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	57
第三章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化	79
第一节 “北大会议”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	81
第二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下)	104
第三节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下)	112
第四节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18
第五节 冯契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28
第六节 萧蓬父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34

第四章 我国港台学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42
第一节 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43
第二节 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48
第三节 罗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54
第四节 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165
主要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4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性质	1
第二节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	1
第三节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方法	1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意义	1
第二章 先秦两汉哲学史	1
第一节 先秦哲学	1
第二节 两汉哲学	1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明哲学史	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哲学	1
第二节 宋明理学	1
第四章 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史	1
第一节 明清之际哲学	1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哲学	1
第五章 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哲学史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哲学	1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哲学	1
第六章 五四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哲学史	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哲学	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哲学	1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史	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哲学	1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	1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哲学	1

绪 论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效工具或技术,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术领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伴随着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始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一样,经历了萌芽、自觉、马克思主义化及我国港台学者的研究等不同阶段或形态。“绪论”以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或创立时期所创建的三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为叙述重点。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自觉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却经过了长期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史思想、学术史方法论的孕育,这一阶段可以称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萌芽阶段,具有自发性、简约性、辩证性、纲领性、动态性、原创性等特点和内容。

20世纪10年代之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进入到自觉时代,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范式和方法,到今天依然难以完全超越。

一是“以西释中”，主要代表人物是谢无量^①、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谢无量 1916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具有了现代哲学意识，开了“以西释中”诠释框架的先河。首先，谢无量对哲学的分类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分类模式，与后来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分类思路近同。其次，谢无量运用了许多西方哲学语言或概念来描述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如：把道家的本体论概括为“道一元论”，把张载的本体论概括为“气一元论”，把程颐、朱熹的本体论概括为“理气二元论”；把孟子的性善说概括为“性善一元说”，把荀子的性恶说概括为“性恶一元说”。又如把杨朱学说概括为利己主义，把法家的政治学说概括为功利主义，还用同一律探讨庄子的《逍遥游》等。再次，谢无量已经初步具备了中西哲学的比较意识，如：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仅仅是一种“想望”，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却是一种历史的事实；认为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虽有不同，但同出于“仁之一念”；认为孔子的仁与佛教、基督教有所不同，佛教、基督教的仁是平等之仁，孔子的仁是差别之仁；等等。

胡适 1919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则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们共同确立了成熟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不仅论证了以西方哲学的框架诠释中国哲学的历史必然性，把中国哲学史从传统的学术史中剥离出来，使它们成为近代学术的一个独立部门，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提出了一套以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工具。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正式出版于 1958 年，但在 1937 年就完

①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新中国成立前任多所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著有《中国哲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等。

成了初稿,1943年还被印为讲义,应该算作新中国成立前的代表作。这是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问题史的书写方式。书中虽然提到过“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概念,但从他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板块划分来看,还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如张岱年自己所说:“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①所以,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也应该算作“以西释中”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代表作之一。

二是“以中释中”,以钟泰^②为主要代表。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间,商务印书馆1929年还出版有钟泰著的《中国哲学史》。该书共两卷四编八十二章,从上古思想写到曾国藩,单列人物117位,其特点偏于“原汁原味”,其诠释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中释中”。钟泰可能对“哲学”和“哲学史”有自己的理解,但在《中国哲学史》中并未明言,我们只能从他列举的篇目中揣摩其思想。

钟泰《中国哲学史》第一章的内容是上古之思想,之所以说“思想”而不说“哲学”,是因为其时文献缺乏,参验不足,不能“过而予之”,“以诬古人”,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该章以问题为叙述方式,谈到了本天、尽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六个问题,兼含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后来的章节中还谈到了法、经济、军事(农战)等方面的内容。钟泰认为,中国哲学始于周公,本于六艺。从第三章开始,该书转入以人物为主的叙述方式。在人物筛选上,其数量众多,许多人物于其他哲学史书中并不多见,如魏伯阳、牟融、徐干、陶渊明、陈止斋、唐说斋、蔡西山、蔡九峰、蔡节斋、真西山、魏鹤山、吴草庐、郑师山、刘伯温、曹月川、吴康斋、张杨园、唐铸万、彭允初、汪大绅、罗台山、洪北江等。这一方面说明钟泰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另

①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自序”第1—2页。

② 钟泰(1888—1979),江苏南京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多所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传统学术及日语。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庄子发微》《荀注订补》等。

一方面说明他对学术、思想和哲学的把握不甚分明。钟泰所列的人物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思想家,但学者、思想家并不等同于哲学家,哲学史也不尽等同于思想史甚至学术史。由此推知,钟泰的著作虽名为《中国哲学史》,但他对“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该书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倒不如称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更为恰当。

“以中释中”的诠释框架与经学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带有浓郁的权威崇拜色彩。但经学的解释学方式有今古文之分,钟泰秉持的主要是古文经学派的解释学方式,“述而不作”,“我注六经”。这在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凡例》中说得非常明白:“此书以史传之体裁,述流略之旨趣,故上下则详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异。……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书中人物,或称子,或称君。或称生,或称公。或称名,或称号。或称谥,或称封。一从常习,意无抑扬。”钟泰立足于中西学术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认为二者不能“强为比附”,否则容易“转失本真”,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学术包括西方哲学的一种委婉拒绝。所以他要以传统的史传体裁叙述中国哲学史,“一用旧文”,“一从常习”。钟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学术史混一,坚持“以中释中”或“还原论”的叙述方法,这在当时可能是落伍的,但在今天又受到学界的重视,留给我们诸多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方面的回味,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三是“以马释中”,以范寿康^①为主要代表。新中国成立前,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开辟了“以马释中”的路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非马克思

^① 范寿康(1896—1983),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30年代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现代哲学”“哲学概论”等课程。出版有《中国哲学史通论》《朱子及其哲学》《哲学通论》《教育哲学大纲》等著作。

主义学者的范寿康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论作为诠释框架阐释中国哲学史,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通论》,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开了“以马释中”的先河。这一点正像他自己在1983年三联书店重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观点却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①

范寿康在“绪论”中,把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称作“解释历史上所应采用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都有哪些内容呢?第一,范寿康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解释社会的发展,认为:“我们把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也可以看做是人类的物质生活里面的被统一着的对立物。为什么是对立呢?因为生产诸力是发现于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上面,而生产诸关系是发现于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上面,故二者不同,即为对立。进一步讲,这二种对立物却又是不可分离的。为什么是不可分离呢?因为我们人类利用自然时,人类相互之间,一定有一种社会的联络,所以生产诸力的发挥一定在其本身上包含有生产诸关系。假定没有生产诸关系,生产诸力的发挥就不可能。因为这二种对立物不能分离,故二者为被统一着的对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社会的发展看做这两种对立物的斗争的历程时,方才对于社会的发展能够澈底理解。”^②第二,范寿康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一切上层构造包括政治的与观念的,或逐渐地,或急剧地,也要随之变更,这就导致了一次次的社会革命。第三,范寿康概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形态,最早是“原始共产制的社会”,接下来依次是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际纠纷和战争愈演愈烈,因此,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是很迫切和必需的。第四,范寿康揭示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歧,阐释了社会存在先于并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所以从这种社会意识(即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

①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序言”第1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7页。

以及政治的各种理论)所构成的所谓观念的上层结构(就是通常所谓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 Ideologie),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①。

范寿康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相当的了解,并且运用这些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运用社会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有些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但一些基本原理很难动摇。尤其是对思想史、哲学史的社会历史分析仍然是我们今天深入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不二法门。范寿康比较早和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从而使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比同代人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入。在研究八卦时,范寿康认为,天、泽、火、雷、风、水、山、地也许在周人眼中是八种宇宙最基本、最神圣的东西。他们根据对自然界的观察,认为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变化可以用八卦的变化加以预测,这就是易之所以称为易的原因。“这一种把宇宙万物看做是无一不变的辩证观似乎可以说是当时革命时代的社会的实际的反映。因为宇宙万物既都在不绝的变化之中,则社会制度的变革(就是由奴隶制而封建制,由殷而周的那种变革)也就可以依据这个理论来加说明。”^②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但往往受到冷遇。为什么呢?范寿康分析道:“孔子的道的不行是当然的,因为他是一个当时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政治论根本与实际社会的演进的必然的法则不相适合的缘故。”^③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其理论有过于冷酷的地方,“但我们一考当时的社会的实况,他的主张也未始不包含有一面的真理。思想家的思想要不外为社会的现实的反映,韩非当然不是例外”^④。后来汉武帝崇尚儒术,罢黜百家,我国思想界乃定于一尊。“这是因为儒家之说主复古尊王,最

①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0 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9 页。

③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68—69 页。

④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34 页。

适于帝王的利用的缘故。”^①《淮南子》的思想大体是出于老庄的,“汉初的社会背景确有使这种思想抬头的可能”^②。综观自汉至清的我国学术思想的历史,儒佛道三家递相消长,“但三家俱求依附帝王以供帝王的御用则一,正如妻妾争宠,互相猜忌,而其目的要在于获得丈夫的爱怜”^③。魏晋玄学的兴起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时局的混乱关系密切。以后其他各种学派、学说的产生也无不如此,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范寿康不仅用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历史,也运用它来分析现实。在谈到中国新思想的建立时,他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假如我们根据这种种现代的实际状况来谈中国的新思想的建立,“那末,儒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我们可以断定它们是都不适用的了。因为儒释道三家不过是从前旧生产关系下的产物,也不过是在那时候才可以供当时的帝王的御用的。现在的中国既经世界的中国,而世界的现有的经济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目下正在崩溃,因此,世界的思想目下也正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所以,照私见看来,中国新思想的建立也许就是世界新思想的建立,而中国问题的解决的途径也许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的途径”^④。

其次是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至今仍是我们认识和分析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我们承认绝对主义在某一方面的深刻性,但片面的深刻所导致的只能是深刻的片面。范寿康比较早和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辩证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不少至今仍为不刊之论。以上提到,范寿康认为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因,孔子的道行不通,但这并不是说孔子的学说没有价值。在对待孔学问题上,范寿康反对绝对的尊孔派和绝对的反孔派,他说:“在尊孔思想与排孔思想同时并存的今日,我们是主张尊孔者应该把孔子之

①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4 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53 页。

③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4 页。

④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26 页。

所以应尊,排孔者应该把孔子之所以应排的理由,先加充分的检讨与阐明,一味妄行尊孔和一味妄行排孔,都是最无意义的事。总之,照上述的批判,孔子的为人与思想之中,有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同时也有值得我们排斥的地方。我们不赞成无条件的尊孔与无条件的排孔。在于今日的我们,孔子只不过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子,他已经失却了从汉武帝以来我国社会所特别赋予于他的那种神秘性了。”^①尽管如此,孔子的思想仍有它的光辉之处。在范寿康看来,“孔子……所创人生诸论,宏深精要,较诸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理斯多德(Aristotle)诸家,有过之无不及。……他的哲学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他以仁为一贯之道,他以忠恕为仁的手段,他以为教育与政治的最后目的也在于仁的实现。这些见解,在中国思想史上不但别开生面,并且在于过去竟支配了中国社会至二千余年之久,就是将来对于人生取忠实的态度的人们,一接触了孔子的这些思想,恐怕也仍能感到相当的同情与兴奋的。……孔子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主情主义。这一种主情的思想,我们不但在于孔子,就是在于耶稣,在于释迦,也可碰到。这,在孔子是仁,在耶稣是博爱,在释迦是慈悲。从来世界上所谓三圣,其根本的见解可以说都是主情的。不过佛教和耶稣教是宗教,儒教却是一种道德哲学罢了。……就实际的社会生活讲,儒教的见解似乎比宗教更为切实,所以由我们看,在宗教逐渐崩溃的今日,孔子的地位也许是比较耶稣、释迦更能维持久远的。我们果能把孔子的思想再加纯化,换句话说,我们果能把孔子关于天的那种暧昧的信仰与思想,从他的伦理观加以排除,那末,尽管社会怎样演进,孔子的根本见解还可以当做真理残存下去,并且对于人类社会是有利无害的”^②。这是运用两点论的方法对孔学至为公允的分析,使我们能够从多维视角把握孔子及其学说。范寿康还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其他学派和思想家,如认为子思把儒家的思想深化了,建立了一种比较明显、比较充实的

①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9页。

②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5—66页。

形而上学。此外,子思的人生哲学却存在着内在矛盾,他一方面承认世界上有生知安行的人,一方面却又主张教育的必要,这种理论是颇难自圆其说的。但子思把修养功夫分为“尊德性”和“道问学”,这对宋代哲学产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韩非的学说条理分明,文辞顺畅,读之令人称快,但也有过于冷酷的地方,如以为父子之亲、夫妇之爱均不可靠等等。

在范寿康之前,冯友兰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了。1927年在燕京大学时期,冯友兰就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稍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主张哲学史的研究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1934年,冯友兰从欧洲回来后做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的题目叫《秦汉历史哲学》^①,它表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已经运用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某些观点。这种做法也体现在冯友兰《新事论》的写作当中。但从总体上说,冯友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是零散的,而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则是第一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和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他运用社会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辩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史内容的解读,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开创了“以马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建构模式。但范寿康的研究毕竟是初步的,其整体构架和部分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尚有待深入。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化阶段,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参照系统和诠释框架书写中国哲学史,其中主要的代表作有冯友兰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萧蓬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另外还有杨荣国、孙叔平以及一批中国哲学史专家所撰写

^① 该文1935年9月发表在《哲学评论》第6卷第2、3期。

的大量中国哲学史著作。1957 年的“北大会议”对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筌路蓝缕的意义,本书后面将有专门论述。1980 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收录了“太原会议”关于中国哲学史以及方法论问题讨论的 32 篇论文,有一些新的突破,但总体上没有超越 1957 年“北大会议”的论域。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不少学者根据列宁的哲学史定义,主张研究中国哲学的“螺旋结构”。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率先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程。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分八章系统阐发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这是目前不多见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专著。1984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修斋、萧蓬父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这是一本重要的论文集,全书收录了 21 篇论文,对哲学史方法论做了多方位的探讨。1996 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张全新的《中西哲学方法史研究》,该书上册是《西方哲学方法的历史走向》,下篇是《中国哲学方法的历史走向》。2006 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桂钿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基础、研究前提、研究方法、论文写作诸问题。20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笑敢的《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包括纵横反思、定向古征、定向今例、现实取向四编。2014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杨海文的《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分内外两篇,其中内篇集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有关问题,有《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中国哲学的“互联网阅读”与“博客写作”》《中国哲学共同体的“诗词作业”与“心灵审美”》等新颖篇章。2015 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晓芒的《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涉及部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宋志明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法新探》,分六章探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和哲学史方法论的相关问题。以上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成果可以说各有特色,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发展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上述中国哲学史以及方法论研究相对应的还有我国台港的中国哲学史以及方法论研究,其主要代表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除此之外,还有罗光、劳思光等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中国哲学史的学科方向和建构方法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出现的“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诠释框架和建构方法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毋庸讳言,“以西释中”“以马释中”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偏向,“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脚,一定程度上湮灭了“中国哲学”的“自我”。那么,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将何去何从呢?笔者以为,海阔天空各自飞的多元化态势不可逆转。多维度的“中国哲学史”建构所可能产生的类型或方向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二是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三是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四是整合式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尽管多维度的“中国哲学史”建构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优势,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更应该面对中国的现实,关注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重视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作为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①

^① 详见柴文华:《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第一章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萌芽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真正自觉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却经过了长期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学术史思想、学术史方法论的孕育,这一阶段可以称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萌芽阶段,具有自发性、简约性、辩证性、纲领性、动态性、原创性等特点和内容。

第一节 中国学术史思想的发展^①

中国传统的学术史思想经过了一个从先秦到明清的漫长发展过程。

先秦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在“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下,先秦产生了诸多思想流派以及影响广远的思想家,学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就触发了当时的学术史研究,出现了一些研究并阐述学术发展脉络、概括各家学说特质并评价其长短的具有学术史特质的著作,其中以《庄

^① 本节与张圆圆合作。